

《贵州名人纪实》丛书

1976 — 2002

夜郎之光

当代卷

(中)

主 编 / 赵运乾
执行主编 / 杨宗和
副 主 编 / 王鸿儒 江明藻
贵 州 民 族 出 版 社

976 — 2002

《贵州名人纪实》丛书

夜郎之光

当代卷

主 编 / 赵运乾

执行主编 / 杨宗和

王鸿儒 江明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郎之光. 当代卷. 中/《夜郎之光》编委会编.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4. 11
ISBN 7-5412-1237-7

I. 夜... II. 夜...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6617 号

贵州名人纪实·夜郎之光·当代卷(中)

主 编	赵运乾
责任编辑	刘 磊
封面设计	吕凤梧
责任校对	张 红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550001)
经 销	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贵州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50 × 1 168 mm 1/32
印 张	18.12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别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前言

贵州是人类发祥地之一，也是古夜郎国故地。这里山川雄奇，风光壮美，物产丰饶，气候宜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贵州各族人民吸取了中原汉文化及周边多民族文化的营养，创造了自己丰富而独特的地域文化，建设了美好的家园，为祖国各民族的团结统一，为中华民族的强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也孕育了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和民族精英，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

早在西汉武帝年间，以夜郎王多同为代表的各部族首领，在“大一统”精神的感召之下，即顺应历史潮流，向化从风，归服中央王朝。嗣后，多同又应诏亲赴长安，接受汉武帝敕封、授印，使夜郎这块蛮荒、僻远之地，从此纳入了中国版图。而夜郎人也因此走上了与主流文化会合的道路，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发展了夜郎文化。其间曾出现过如盛览、尹珍等向汉文化虚心问学、还乡传播文明，“首开南疆之学”的一代名士和教育家。可惜夜郎立国两百年后，即遭覆灭，夜郎文化流散到了各个世居民族的文化之中。作为弱势文化，此后虽经唐、宋、元数朝，由于教育未兴，故人才寥寥。至明代贵州立省，则为之一变。太祖朱元璋诏谕中书省臣：“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于是贵州始大力兴学，人才则“联袂而起”：奢香、黄绂、周瑛、徐节、田秋、王训及孙应鳌等，既有名留青史的女政治家，也有著述宏富的学者、诗人。平越卫（今福泉市）人黄绂曾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为有明贵州名臣之冠”。延至晚明，贵州人才如潘驯、陈尚象、谢三秀、杨龙友及吴中蕃等更

极一时之盛。崇祯年间，皇帝下诏“求才”，全国共得10人，而贵州就占了2人，即何腾蛟与丘禾嘉。有明一代，贵州中进士者109人，中举人者1145人。人才之盛，即使是文化向称发达的中原人士，也不能不刮目相看。而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贬至贵州，于龙场悟道，正是在贵州创立了他的心学。清代以后，贵州更出现了如周渔璜、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名满海内的诗人、西南硕儒及外交家。“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此种评价决非溢美。至近现代则有丁宝楨、陈夔龙、李端棻那样的晚清名臣；有邓恩铭、周达文、邝继勋、龙大道、周逸群、王若飞、周素园、陈曾固、宦乡、韩念龙、雍文涛、周林、徐健生、秦天真、吴实、申云浦、李庭桂等革命家及党的优秀工作者；有乐嘉藻、周恭寿、黄齐生、凌秋鹗、白铁肩、马宗荣、张敷荣、孙铭勋那样的教育家；有姚苕父、严寅亮、邱石冥、蹇先艾、谢六逸、段雪笙、桂百铸、宋吟可、王渔父、袁晓岑、方小石、谢孝思、萧娴、陈恒安那样的作家、艺术家；有丁道衡、乐森珥、罗绳武、刘薰宇、萧文灿、张永立、罗登义等科学家；也有华联辉、华问渠、华之鸿、赖永初等为发展贵州社会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民族工商业者。民国前后即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的贵州人更数不胜数，作为戊戌维新变法前奏的“公车上书”，当时康有为聚十八省举子会议，在签名的600余人中，贵州即占了95人；辛亥首义副总指挥王宪章，“刺袁（世凯）三杰”中的张先培、黄之萌，都是贵州人；与蔡锷同时策划起兵反袁的“天津会议七君子”里，贵州人有王伯群、戴戡、蹇念一、陈国祥4人；辛亥革命后，在全国数十省中，脱离清廷而宣布独立者，贵州名列第六。可见，在历史的大变动中，贵州人多得风气之先。而任可澄、张百麟、黄泽霖、钟昌祚、平刚、朱启铃、何应钦、张道藩、袁祖铭、周西成等都是那时期曾经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贵州明清以来人才辈出的事实，还有所谓“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说法，难怪清人有诗曰：“万马如龙出贵州”，即是此种人才大观的真实写照。

贵州历史上人才盛况的出现,无疑是贵州传统文化孕育的结果。贵州传统文化包括夜郎文化与移民文化两部分。夜郎文化是从贵州本土喀斯特山地上生长起来,同时又在与中原文化及多种外来文化碰撞、融合中发展起来的文化。高山深谷间生存环境的艰难,养成了夜郎文化中渴望走出大山、有所作为而又朴实、好学、坚韧、勇于死打硬拼的精神。贵州是个多民族省份,自西汉以来,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移民,所以此种盛况的形成,也与移民文化有关。前述的名人中不少人即是明、清之际调北填南的后裔或抗日战争中移民来黔者。移民文化在进入贵州的不同历史阶段内,带来了那一时期发达地区的先进文化,在与贵州本土文化碰撞和融合中,也吸收了夜郎文化的精华。移民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不安现状,富有创造性及开拓精神,因而扩展了贵州人的心胸,涵养了贵州人的智慧。开放、进取,智慧、坚韧,敢为天下先,是成才者的基本素质及要求。历史进入20世纪之后,欧风东渐,贵州传统文化也经历了一个向着现代性转化的历史过程。这一转化无疑为贵州开阔了人才成长的空间,留下了丰富的人才储备。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关心贵州,为了支援贵州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批批干部、学生、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从全国各地来到贵州,为贵州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作出了无私奉献;与此同时,贵州省各大专院校培养出来的许多优秀人才,也在省内外各条战线上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内,他们之中不少人成了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教授,共同组成了贵州高原群星灿烂的人才星空,闪烁出耀眼的光华。可以说贵州当代人才的成长,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贵州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实现其现代性转化的结果。

贵州在新时期涌现的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贵州的骄傲。他们之中不少人贡献突出,成就巨大,风格高尚,德艺双馨,是

先进思想、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事业的一支最活跃的力量。可是历来对他们宣传甚少,集中地宣传则基本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有感于此,我们自动集结起来,选择了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的一大批精英名流为对象,在有关部门支持下,组织采写并编辑出版了这本《贵州名人纪实·夜郎之光·当代卷》,集中展示了他们的奋斗经历、成就贡献与道德情操,以期推动我省“两个文明”建设,增强夜郎人的自信心,促进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长期以来出于社会及历史的原因,外界对贵州所知甚少,甚至有过相当程度的误解。而夜郎精英们的感人事迹,他们的智慧及其辉煌业绩,无疑能增进人们对贵州更全面的了解。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人才难得。特别是在贵州这片土地上,更是如此。而人才的形成首要之点是发展教育。因此贵州要发展,就必须千方百计地培养人才,想方设法地留住人才,细致周到地爱护人才,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人类历史发展到了21世纪,在这个以知识经济为特点的新的世纪,人才的优势更加凸显出来,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资源与设备。西部大开发为兴黔富民提供了新一轮历史机遇,这同时也是一场新的竞争。贵州同中西部其他省区一样,都取得了参赛权。参赛中的竞争,实质就是人才竞争。贵州只有调动一切人力、财力,大办教育,才能拥有大量人才。而拥有大量人才,贵州的发展就一定大有希望。基于此,我们将这部荟萃了贵州一流人才的《贵州名人纪实·夜郎之光·当代卷》奉献给读者,应该是适时的,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愿夜郎人才之光发扬光大,引出更多的夜郎精英。

2002年8月7日

目录

蹇先艾:当代贵州文学领军人	王鸿儒(2)
罗登义:刺梨之父	吴世祥(13)
唐弘仁:向黑暗进击的勇士和闯将	杨宗和(27)
吴向必:武陵骄子	江明藻(50)
滕久明:天道酬勤	东方明(61)
季克良:酒海弄潮人	吴世祥(73)
罗冰生:为钢铁奉献的人生	田米亚(85)
袁仁国:“国酒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田米亚(96)
李顺骅:从苗岭走向世界	龙建刚(109)
陈福桐:民主先声 文化老人	付汝吉 刘学洙(134)
刘纲纪:珞珈山上的美学沉思者	邹元江(148)
侯绍庄:追寻历史的底蕴	杨宗和(160)
吴大华:侗乡走来的法学博士	杨 宛(180)
颜 迈:永远的天边线	杨宗和(188)
黄万机:由平淡走向奇崛	庞思纯(203)
邢其毅:享誉国内外的有机化学家	杜松竹(216)
陈汉彬:昆虫学家的大千世界	杨宗和(225)
杨炯达:勇闯脑海禁区的医学家	陈世忠(244)

潘成杰:跨世纪的建桥人	杨宗和(251)
宋宝安:描绘光彩人生	陈金平(270)
侯国佐:踏遍青山人未老	赵运乾(279)
金道超:金道超的绿色梦想	商毅(299)
朱守谦:让生命永驻绿色	戴佳村(307)
戴保威:敢向禁区挑战的人	杨虹(323)
范寿年:拼搏人生	晓舟(330)
乐黛云: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	王鸿儒(341)
石果:历尽沧桑结硕果	王鸿儒(363)
廖公弦:活活的山泉	戴明贤(380)
伍略 罗星芳:“阿养悠”与“蔓萝花”	余岛(390)
苏晓星:把文学熔铸进生命中的彝人	安尚育(406)
顾汶光:在历史小说的天空翱翔	顾朴光(419)
石永言:从遵义到延安	宦迪(440)
余未人:华章素言见真淳	张幼琪(455)
方小石:我眼中的大师	陈争(469)
袁晓岑:冲霄的白鹤	周青明(486)
魏宇平:永不辞劳瘁 涓滴为苍生	杨宗和(493)
王振中:墨耕黔山谱画魂	杨筱堃(514)
杨绍杞:苗岭飞出的金鸡	王蔚桦(523)
龚琳娜:有首歌儿就是我	杨宗和(533)
陈音:苦乐箏琶	杨宗和(555)



蹇先艾：(1906 ~ 1994 年)贵州遵义人。1920 年赴北京求学，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毕业后在松坡图书馆工作，并在弘达学院兼任教职。1937 年“七七”事变后回到贵州，先后担任遵义师范学校校长、贵州大学及贵阳师范学院教授，主编过宣传抗日的刊物《每周文艺》以及《贵州日报》副刊《新垒》等。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化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贵州省文联主席、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席及民盟贵州省委副主委、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3 年 10 月曾作为中国文学艺术家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加拿大，同年加入共产党，1994 年逝世。

蹇先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名世。成名作《水葬》受到鲁迅先生的肯定与赞赏，代表作为《在贵州道上》。出版过《朝雾》、《一位英雄》、《还乡集》、《酒家》、《踌躇集》、《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幸福》等八部短篇小说集及中篇小说《古城儿女》，散文集《城下集》、《离散集》与《乡谈集》，此外还出版了《国学三百知识答问》、合作译著《英国短篇小说集》等。建国后有《新芽集》、《苗岭集》、《山城集》、《倔强的女人》及《蹇先艾小说散文选》、《蹇先艾短篇小说选》等出版。

蹇先艾

当代贵州文学领军人

王陆儒

不朽的业绩

蹇先艾生前是贵州文学领军人，这是由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人格精神的魅力所决定的。蹇老德高望重，心存厚道，从无嫉妒他人之心，专以扶持、奖掖文学新人为职志。他很有服务精神，在世之时，不遗余力地推举文学新人，因此得到贵州作家普遍的拥戴。但蹇老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乡土文学作品曾经产生过怎样的影响，今天的人们就不甚了然了。有人甚至说：“蹇先艾么，不就因为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对他的小说称赞过几句？没什么了不得的呀！”可是我要告诉你，鲁迅在这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所评价者，还只是蹇先艾1926年以前的创作，那时候，他才不过是一位20岁的文学青年，此前一年，刚刚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尚在预科求学呢！

蹇先艾文学创作的鼎盛期是在20世纪的30~40年代。从五四中期他唱着乡音步入文坛，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位文坛多面手，发表过近百首新诗，出版过散文集《城下集》、《离散集》、《乡谈集》，写了一百多个短篇，出版了《朝雾》、《一位英雄》、《还乡集》、《踌躇集》、《酒家》、《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幸福》等八个集子及中篇小说《古城儿女》。蹇先艾对于新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

的。早在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时,他就与同班同学朱大楠、李健吾共同发起成立了五四以后中国最早的青年文学社团之一的“曦社”,并创办了文学刊物《燭火》。在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王统照主编的《文学旬刊》以及赵景深主编的天津《新民意报·朝霞》等副刊上发表作品。自徐志摩主编《晨报诗镌》后,蹇先艾与朱大楠、刘梦苇、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等为该刊经常撰稿人,不用说,这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串闪光的名字。他的《雨晨游龙潭》、《春晓》二诗,曾由朱自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刘梦苇在《新诗坛的昨今明》一文中认为新诗经过了几年的摸索,到了徐志摩、闻一多、于赓虞、蹇先艾、朱湘等人的手里,不只蕴含了“真实的情感,深富的想象”,且具有“美丽的形式和音节、词句”。因此他十分赞同闻一多的意见,以为至此“中国诗似乎已经走上了正轨”。这虽是新格律诗派的夫子自道,未必中肯,但是蹇先艾像闻一多那样“戴着脚镣跳舞”,对新诗的音乐、绘画及建筑等三个方面的美感作大胆探索与追求,在新诗发展史上却是一份不可磨灭的劳绩。以至诗评家钱光培、向远在1982年出版的《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一书中还列有专节论述他的新诗,认为“蹇先艾的诗显得典雅,很像是古诗词的新译”,“他虽然用了不少文言词语,但不生癖,不古奥,稍有文字知识的人就能读懂”。

对蹇先艾的散文,最早进行评论的是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评论家的李健吾。他认为“在我们今日富有地方色彩的作家里面”,蹇先艾“是最值得称道的一位”,“他的文章不弄花枪,笔直戳进你的心窝,因为他晓得把文笔揉进他的性格”。而蹇先艾的游记,“不是名人的游山玩水,不是骚客的吟咏题跋,全得之于无心,终而成为一个有心人的甘苦……这是一个三等车的乘客,一个现代散文化的诗里的白居易,拿人间的忧患来养育他多情的灵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林非在《现代散文六十家札记》及《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二书中,也称道蹇先艾“撰写的有些描摹人物的

小品,显得栩栩如生,很能传神”。蹇先艾建国后主要从事散文写作,有《新芽集》、《苗岭集》问世。评论家冯健男在1962年曾有专文评述,认为有如下特点:一是作家写到了农村各方面的人物;二是写出了事件的地方特色和时代意义;三是作家不只及时地描叙现实中的大事、盛事,而且也随时记述生活中的小事、平常事,同样写得有意味,有感性。除此之外,他这一时期的散文还能将叙事、写景、抒情,自然亲切地糅合在一起,保持了作家过去的散文作品的“简朴”之美。

蹇先艾的文学成就当然主要体现在他的小说上。鲁迅的评价已经广为人知:《水葬》“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蹇先艾作品是简朴的”,“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同时也中肯地指出了蹇先艾早期小说的弱点:“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其实在鲁迅之前,蹇先艾小说已经引起了评论家及小说史家的注意,李长之、张寿林曾撰文评介过他的《朝雾》、《狂喜之后》等作品,郭箴一所著的《中国小说史》一书中还称道了他的《水葬》等小说。而李影心在20世纪30年代评论蹇先艾的《踌躇集》时,即已看出他为克服作品视界狭小及取材琐屑所作的努力:“到今日,我们且见出作者沿着真实的绳索向上攀引,甚至预备打开了那‘狭的笼’。”香港的黄河则在他续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集小说二集“导言”中说,从蹇先艾1928年以后的作品中看,“不论是内容和写作技巧都比前一个时期坚定得多了,表现贵州山区农民和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悲惨生活,还是相当广泛而深刻的”。认为他在第二个“十年”间所写的作品,如《在贵州道上》、《盐巴客》、《乡间的悲剧》等“在内容方面是相当广泛而深刻的,写作技巧也达到了一定完美的地步”。蹇先艾文学创作很早就产生过国际影响,早在1929年,他的小说《初秋之夜》就已被苏联文学界译成俄文,选进了以鲁迅小说为首的《当

代中国短篇小说集》，由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建国后，虽然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由于极“左”思潮干扰，学术界对乡土文学这个流派的研究与评介都很难到位，但是文学史家王瑶的《新文学史稿》以及多种现代文学史对蹇先艾乡土小说仍有论述。从以上事实看来，1948年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杰斯将蹇先艾称之为中国“卓越的短篇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显然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溢美之辞了。

文士本色

蹇老之受人尊敬，文品之外，当然还有他那高洁的人品。就自身涵养而言，显示出文士的本色；在对人对事方面，则成为仁者的风范。

我初识蹇老，是在大学读书期间。20世纪60年代初，我入校不久，蹇老应邀来中文系讲学，讲演结束后他又留下来同我们一些爱好写作的同学座谈。他都说了些什么，时过境迁，记忆里都模糊了，惟他那朴实、谦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因为这样，事后我才有胆量将一些习作寄出，向他请教。而蹇老并不因为来信者是个无名小子便置之不理，他回了信，对我寄去的几首诗逐一提出意见，从此开始了我们的文字之交。70年代末，我考上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后，蹇老又受聘担任文艺学专业的指导教师，我因为选了蹇先艾作为研究对象，与之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我才知道，他虽然出身于遵义的一个官宦世家，但这个大家族在他祖父那一辈却已经败落下来。13岁那年，父亲送他至北京求学。在返乡的路上，不幸猝然去世，不久母亲又死在故乡。少年蹇先艾成了飘泊异乡的孤儿。他住在兄长家里，一间小小的门房，一床一凳，就是他好些年里的生活世界。但也多亏了此行，恰如我后来的《蹇先艾评传》一书中所写，蹇先艾“当年若不是走

进了代表中国最高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大都市,不是在这里感受到民主主义思潮的冲击,那么他是不可能从贵州山区封建宗法制思想的禁锢下尽早解放出来”,成为一位现代作家。他与王鲁彦、裴文中、许钦文等人共同开创了乡土文学流派,并成为代表作家的。那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中作家与本土分离的结果,也是世界新文化、新思潮影响下产生的结果。少年蹇先艾那时候虽然心境寂寞,但是他身边却围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诗友。而且因为身处政治、文化中心,加上投稿的缘故,他结识了王统照、朱自清、闻一多、徐志摩、郑振铎、叶圣陶等前辈大家,并得到过他们的奖掖和指点。王统照介绍他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大学者梁启超还亲自为他题词:“先艾学诗宜至力”,给了他极大的鼓舞。生活虽然困窘,但是他读书却非常刻苦用功。兄长给他有限的早点钱,常被他节省下来,忍着饥饿,用于买书。我常常惊叹五四那一代学人学识的渊博,文化修养的深厚,堪称学贯中西,所以那是一个产生大师的时代。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钱钟书这样的巨匠不去说了,就是蹇老,也曾经撰写、出版过《国学知识三百答问》,还出版过他亲自翻译的《英美短篇小说集》。一些“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文坛“新锐”虽然对现代作家的创作颇怀轻藐,但在他们雄厚的学养面前,却不能不甘拜下风,痛感浅薄。

蹇老这一代作家学养的丰富有诸多原因,但是敬业精神,对文学的执著追求却是最主要的。蹇老在大学里学的是经济,毕业后却没有接受薪俸可观的经济界的诱惑,只在松坡图书馆做了一名小小的编纂部主任。只因为这里读书方便,可以结交文艺界更多的朋友,利于他所酷爱的创作,在职业的选择中也显示出文士的本色。结婚不久,他们有了孩子,家庭的重担挑到了肩上,微薄的工资与稿费已入不敷出,他不得不在弘达学院、女子中学等院校代课。他的时间像“拉散车”一样地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但他却仍然坚持着读书、写作。他嗜书如命,所得稿费的大部分都用来购买各

类图书,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的藏书已经很可观了,可惜抗日战争初期不得已化装逃出沦陷的北平,已经损失大半藏书。回到贵州,他一面教书,一面办报,以维持战时物价飞涨的贫困生活,而购书的嗜好却一直不减。建国后他的生活有了保障,购书就更多了,至“文化大革命”时,他已经有了八架书,却不料“造反派”抄家,他的八架书一下子损失了六架。“日本鬼子劫我一回,‘造反派’又来劫一回,多少年珍藏的书籍毁于一旦!”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去拜访他,问起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对经历过的磨难淡淡地谈了几句,便把话题转到藏书上去了。他说着一边从书架上抽出一册旧版书,是一本《游仙窟》,扉页上还钤着他的印章。蹇老告诉我,这篇唐人传奇早在明清以前就已绝版,流失到了国外。鲁迅先生留学日本时费了很大力气才从东京一家图书馆借出抄了下来。先生回国后,为了保存祖国文化遗产,又自费印行,印数不多,他当时得到消息,就赶去买了一本。离开北平时,很多书都丢了,只带了一些实在舍不得的书,这《游仙窟》就是其中一本。我问:“这本书怎么会逃过了劫难?”他说:“哪里逃得脱!那是第二年,也是这样阴冷的天气,我有事经过金沙坡,看到路边的荒货摊上有些旧书,鬼使神差般我走了过去,瞧见被抄走的《游仙窟》竟流落到了这儿!我想把书买回,可是老板开口就要5元。那时候我每月只领15元生活费,还要养家,送了他5元,全家人吃饭就会受影响。不买吧,心又不甘。后来老板总算开恩,以3元5角成交,这本书才物归原主。”

我默然地看着蹇老,情不自禁地生出敬意。眼前仿佛掠过了鲁迅先生在日本秉烛夜抄《游仙窟》的背影,掠过蹇先艾在凄冷的寒风中捧回这本书的面容。埋头苦干,穷且益坚,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些文士,我们这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才能穿过岁月中无数次的浩劫,得以薪尽火传。

仁者风范

蹇老在他的乡土文学创作中,以绝大的篇章、最深厚的感情献给了旧贵州这片苦难的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挣扎着的人们。在他的笔下涌现出的众多人物,挑夫、马夫、滑竿匠、盐巴客、乞丐、草药贩子、家庭主妇、失业青年、农妇、小职员、女艺人、教员……对于他们的不幸遭遇,无不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表现出一位现代作家的人道关怀,也是传统文化仁爱精神的体现。仁者爱人,实际生活中的蹇老,也是这样一位仁者。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抄走了蹇老当年给我的信件,我因之可笑地成了“蹇先艾文艺黑线”上的人物,遭到围攻与批斗。蹇老后来不知听谁说起此事,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关切地问我,脸上流露出悲戚,自责地说:“让你也跟着受苦了。”谁都知道,蹇老是贵州文艺界受迫害最早,吃苦也最多的一人,可是他对自己的受难从不多说,也很少抱怨,常说:“国家尚且不幸,更何况个人?”而对于一位普通作者的遭遇,他却充满了同情和怜悯。我常想,一个人若无仁者之心,是不会像他那样大度,去承担起别人以至一个民族的苦难的。这也许正是那些优秀作家与他人的不同之处吧?

蹇老不是一个热衷于权力的人。但是建国以后,出于他的成就及影响,党和政府给了他各种荣誉与职务。大量的会议占去了他的写作时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复出后,他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不只一次推辞过那些职务,推辞不掉只得又苦笑着承担下来。而无论怎样忙,他都要挤出时间阅读贵州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关注着我们的每一点微小的进步。为了写作《蹇先艾评传》,他不仅为我提供了劫后余生的部分作品,尤其是他那本不轻易示人的诗集《孤独者之歌》手稿,给我的研究带来了极大方便。在每次采访中,他都不厌其烦地解答我所提出的问题。最令我感